

自我意识的历史嬗变与多维解析

张晓红¹, 谢震²

(1.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2.西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自我意识是对意识自身的认识,人的自我意识的提升表现为人对自身内在本质的不断丰富和对人类存在价值的整体把握。在哲学史上,本体论与认识论开启了理性致思的视域,并以理性精神表现了那个时代的自我意识,但其对人的认识却始终禁锢于理性的藩篱。马克思将自我意识置于实践论视域之下,赋予自我意识以全新的内涵,使人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反思自身的本质,形成关于人自身的真理性认识。进入新时代,必须在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魅力的同时,不断提升人的自我意识,沿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路径,探索人类自我意识的另类理论诉求。

关键词:自我意识;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感性活动;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2)06-0045-10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2.06.006

The Historical Transmut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Self-Consciousness

Zhang Xiaohong¹, Xie Zhen²

(1.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Liaoning, Shenyang 110169, China;

2.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Abstract: Self-consciousness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awareness itself, whose enhancement is manifested in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man's understanding his own inner essence and in the overall grasp of the value of human existence.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opened the field of rational thinking and highlighted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that era with rational spirit, bu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ings was always confined to the fence of reason. By placing self-consciousness in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Marx endows self-consciousness with a totally new connotation, enabling people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essence in real social relations, and to form a truthful understanding of themselves. Walking into a new era, while understanding the charm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human self-consciousness, and to explore the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appeals of human self-consciousness along the path of the unification of history and logic.

Key words: self-consciousness; ontology; epistemology; practicalism; perceptual activities; subjectivity

收稿日期:2022-08-21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SC21C086);四川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中心项目(SZQ2021042)

作者简介:张晓红(1969—),女,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谢震(1988—),男,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人类自产生起,对外在环境与自身的察觉和认知便开始了,随着人类能力的不断增强,这一察觉和认知过程也在不断深化。苏格拉底时期,这一过程开始从自然哲学向人的哲学转向,将投向自然和宇宙的目光转向关注人及人类社会。从“人是万物的尺度”到“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都表明人的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预示着自我意识的“在场”——实际上,哲学的发展体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成长过程。自我意识是对对象化意识的扬弃,是对意识自身的认识。自我意识作为人的活动的基础,最终以理论的形式表达人类的自我本性和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认知。一方面,从对终极因的不断探究来看,人的本性是追求超越性、追求自由、追求至善的;另一方面,从人的现实生存意义来看,人在与世界的对立统一中完成自身生命的维持和延续,人对人自身的认识在人与他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实现。

人的自我意识的提升,表现为人类对自身内在本质的不断丰富,以及对人类存在价值的整体把握。人的自我意识提升过程存在两个关键环节:一是人意识到自身作为认识的主体而存在;二是人的认识活动指向由外部对象转向自身。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和从认识论向实践论的转向,都体现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在转变过程中,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和深化得以完成。

一、古希腊本体论视域下自我意识的觉醒

早期希腊哲学脱胎于远古宗教神话,延续了《神谱》和“创世说”的思维模式,把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并共同受制于某个主宰者,但同时也开创了一种新的解释方式:“用事实和理由来说出原因或理由,因而可以检查和讨论”^{[1](P150)}。这一阶段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力图探寻宇宙万物的“本原”,即“事物生成的

初始之点”,并期望从它身上获得世界展开的逻辑规则,其被称作自然哲学,自然是它的第一个研究对象和基础。早期希腊哲学将目光投向宇宙,提出了“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对世界本体的解读。关注“世界是什么”的自然哲学没有明确将人与万物区分开来,而是把人与其他万物等同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且都被视为源于同一本体。因而,认识了世界也就认识了人自身,即把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人类自我超越的路径寓于本体论探索之中。此时的自然哲学没有意识到人与其他生物的差异,只是将人视为附属于自然的存在,人自身的价值和自由也只源自外在于人的理性精神。因此,在这一阶段,意识的对象虽然只局限于外部对象而没有深入对人自身的思考,没有把自身作为认识的对象而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但对自然的探究表明,人类已经开启了主体自我意识觉醒的进程。

“世界是什么”——是要追问宇宙万物的本原,即始基,其思维逻辑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面向作为认识对象的世界的认识的结果(本原)。由于这一阶段人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局限性,这里的本原(始基)多以水、火、气等物质性范畴表达,但也明确“本原是指事物的产生和生成的起源、开端以及我们对事物的认识的起点、出发点”^{[2](P10)}。米利都学派认为,自然万物是感性的、特殊的,并且不能具有与之相反的感性性质,而本原却必须是被否定了感性性质的东西。为了解决这一逻辑矛盾,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可以“用感性性质上的无规定者作为感性自然界和万物的根本原因”^{[1](P151)}。而关于本原的统一性和万物感性的多样而矛盾的思辨,则推动了思维从具体感性向抽象理性的方向发展。由此,思辨哲学的发展预示着人类自我意识水平的提升。毕达哥拉斯学派通过对奥菲斯教的革新,将哲学与科学的理智以及伦理价值融入其中,并提出“灵魂说”。毕达哥拉斯

学派将“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灵魂的净化(上升为纯洁的灵魂),进而达到摆脱一切肉体轮回的神的境界”视为人的最高幸福,这一观点表现了当时社会条件下人的最初觉醒和自我意识。

“始基”的具象性在巴门尼德那里被突破,“存在”一词由此产生。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开启了人类形而上学的追求,并将形而上学的对象确定为存在。他认为,存在是逻辑上先在的自体(水、火、气是属于非存在的),认识非存在只能走向意见之路,而存在(存在是不生成的、不灭的、完整的、独特的、不可移动的)才通向真理之路^{[3](P85)}。哲学应该关注存在,其与思想是同一的,这是智慧女神为人指出的“可以放胆遵循”的研究途径。

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是肯定人的自我意识提高的重要节点。他的存在不是有形的且转瞬即逝的感性存在物,而是一个不具备任何规定性的纯存在,是只能用概念、符号表达的思想中的存在。他已将思想和感觉进行了明确区分,人的思想是人的心灵器官的一种理性能力,而感觉只是关于现象世界的意见的来源。在此基础上,他强调,“要用心灵(努斯)牢牢注视那遥远的东西,好似近在眼前”^{[3](P45)},对感性存在物的认识只能获得意见,只有对纯存在的理性思维才能获得真理。有了概念、符号才有了认识结果的思维表达,人思维中的世界才是可以言说的世界,人的自我意识也才能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反思的形式,即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表达出来。巴门尼德用严密的逻辑论证了存在的本质世界与非存在的现象世界之间的对立,“哲学被提升到思想领域”,他的逻辑论证方法最终形成了一种主观辩证法。

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通过形而上的思辨与逻辑分析,探索存在的本质,自觉反思人的理性思维。这一时期,对人和社会的探究也得以加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是对人的主体意识的彰显,肯定了感性的人在世界和社会中

的中心地位,而“认识你自己”则是关于人的哲学纲领性宣言。人以自身作为知识的对象,其前提就是人有研究自身的能力。

苏格拉底将哲学研究的主题确定为认识人本身,认为要关注人和生活本身,教导人对自己要有彻底的反省和自觉,从而认识和改造自己,进而改造生活和世界。他指出,“在人事的问题上,真正的原因不在自然和物欲方面,而在人的心灵或灵魂,在你把什么东西认作‘好’(善)。”^{[1](P325)}人是有思想灵魂的动物,人的一切行为都受一种有目的的思想支配。“认识你自己”就是要研究人的灵魂,而灵魂以追求“善”为目的。“在认识中,自我意识一方面表现为本质、自为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存在。它自己意识到这个区别,又从这个区别折回到二者的统一。”^{[4](P110)}苏格拉底把“神意”寓于人的主体意识之中,“他提出原则来代替神的英雄……拿人自己的自我意识,拿每一个人的思维的普遍意识代替神谕,——这乃是一个变革”^{[4](P96)}。

柏拉图沿着巴门尼德逻辑的自体路径构建了哲学史上第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哲学体系——“哲学之作为科学是从柏拉图开始而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4](P151)}。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相”是其核心概念,是事物自身的规定性,是世界和万物的根本原因或本原。“相”具有普遍性,构成了一个客观的、独立存在的、唯一真实的、以“善”为最高原则的可知世界——但它只能凭借思想(理性)被把握,且只有对“相”的认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可感世界是具体的、变动的,也是不真实的,因而对可感事物的认识只是“意见”。基于此,柏拉图强调了知识的优越性。柏拉图的“线喻”是对两个世界、两种认识和两种能力划分的进一步说明。“善”作为“相”的原因是终极的存在,是人的根据和行动法则及其他所有存在和本质所追求的目的,也是一切知识的根据和终极真理。柏拉图的“相论”涉及了人类生存实践的根本问题,人的本性也在思辨形式上

被确定为伦理理性。在柏拉图看来,局限于可见世界和物欲就会使人失去自由,要摆脱可见世界进而转向可知世界,必须借助灵魂的力量——他的“洞穴比喻”正是对只有摆脱感官束缚的人才能认识真实的存在的阐释。走出“洞穴”的人,因为见到了真实的存在,也因为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无法回到“洞穴”之中。柏拉图以“相论”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其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理论,第一次对人类的生存样态作出乌托邦式的描述。他把哲学导向理智和超感世界,并把意识提高到精神领域。但由于柏拉图“相”的世界与可感世界的二分,不仅使“相”的世界的永恒性在现实世界的多元性和流变性面前存在被否定的危机,而且使人的价值和生存的根基在形而上学层面也面临巨大挑战。

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地继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而上学作为研究第一因的理论体系是最高的理论知识,是关于本体的学问,其研究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他把世界的本体规定为实体,实体本身作为形式与质料的统一体,又以纯形式作为自身存在的依据和目的。纯形式作为一类事物的共相存在于同类事物所有个体之中,它具有普遍性。这个纯形式就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追求的第一因,被其称为“神”。纯形式作为独立的不依赖于质料的神性存在,乃是自我思维的理性,是纯粹的思想,是一切变化的根源,也是万物所追求的目的。人也要服从于这个“自然神性”所确定的秩序,即服从和认识普遍性真理。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知识(普遍性真理)与实践知识(相对性真理),并进一步强调最高本原与感性经验的结合。他将感觉和感觉器官与“四元素说”联系起来,认为“没有感觉动物就无法生存,灵魂就无法思维”^[2](P316)]。从逻辑的角度看,要认识特殊必须通过感觉,没有感觉就不能归纳,也就不可能获得普遍性的知识,因而感觉

是人的认知起点。然而,作为人的本性的求知是对第一本原的探求和对至善的追求,因而感觉并不是生成智慧的路径。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体系,对人及人类社会进行了深入分析,融汇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巨大进步。

肇始于巴门尼德,完成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为人自身构建了一个依靠思维把握的精神实体,使人类理性在抽象思维能力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此时的形而上学还仅是以人的理性为思维工具来实现对客体(精神实体)的认识。作为主体的人仍然是融于自然世界中的一份子,人的自我意识仅仅处于初步觉醒阶段,人自身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彰显。虽然智者派的普罗泰戈拉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要求把人当作独立于自然万物并决定自然万物的“标准”,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智者派强调的只是人的感觉,走的是“意见之路”,只有理性才是通向真理的道路,理性也是人之为人的依据。从巴门尼德经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理性一直被肯定为人的本质,感性(感觉)则被排除在人的本质之外。人的感性与理性是分离的,人的肉体的感性需要被看作低级的、专属于动物的本性,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却是仅次于神性的存在,并要求人在以理性把握真理的过程中确立人的生存样貌。人的理性是表现为理念、纯形式、自然神性等外在于人的精神实体。人以自然整体理性的形式肯定自身的存在,作为主体的人只是隶属于自然且非独立的自在的人,其理性活动不具有独立性、纯粹性,要受制于外在的精神实体。也就是说,人还不能把自己作为手段,通过自身建立自己的世界。但是,人类的超越性本性又必然要求理性自身的独立,要求打破人与自然的整体性,还理性自身以主体的能动性,使理性成为“思维着的精神”。这个任务在中世纪经院哲学时期,以宗教神学的形式实现了。

在经院哲学中,人是介于上帝与动物之间的有限的理性存在,既有上帝的理性又有动物的感性欲望。努力克服肉体的感性欲望以趋向上帝被看作是人的理想生存状态,人的理性和感性被彻底分离。这一观点肯定了人的理性作为“思维着的精神”,把人的理性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神性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能动的“思维着的精神”。然而,人作为上帝的作品,其能动性是上帝赋予的,理性的能动性只是在上帝赋予的理性框架内行使主动权。人的理性实质上仍受制于外在的精神实体(上帝),人的本质也由自然哲学时期的自然理性转变为上帝理性,“在基督教神学那里,自我意识、人的思维,人的纯粹的自我都被否定了,它只有沉没在外在的自我即彼岸的自我中,才能获得它的价值和意义。”^{[5](P284)}人的理性的价值不是确立人现实生活的意义,而是论证上帝的存在和意志。虽然这一时期人的理性被束缚在上帝理性之内,但毕竟人类理性有了主体自觉,为自我意识在近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4世纪以后,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类的主体性得以肯定,哲学迎来了认识论转向——以人类自身为认识对象,人既是认识活动的主体,同时也是认识的客体,这意味着人的自我意识得到巨大发展。

二、近代认识论视域下自我意识的演进

在古希腊哲学之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人对于现实世界的理性价值被否定,只能在彼岸世界中,即神的世界中寻求人存在的依据,人的本质被抽象化、绝对化为外在于人的神性。到了近代,由于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哲学开始重新关注人自身,关注人的生存与价值。这种哲学转向,一方面,明确了人以自身的理性去认识外部对象,将理性作为认识的工具而不再是本体论哲学中认识活动的非自觉的前提。也就是说,哲学的启蒙完成了人类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即人意识到自身作为认识

的主体而存在。另一方面,表明近代哲学在要求确立世界的本体之前,首先考察理性的合法性问题,即“正当性的证明”。这种对人类理性的考察与反思意味着人的认识开始转向对人自身的认识,即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完成了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同时,解释了自我意识的起源问题:“自我意识即意味着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的同一,其发生机制是:认识的主体从一切具体特定的客体中抽身出来反思其自身,从而意识到它始终与自身相同一。”^[6]

认识论转向为人类达到对自身的真理性认识做好了准备,并从感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两条路径丰富了人的自我意识的内容。以培根为代表的感性主义路线立足于人的自然属性,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提出人的本质是自然的、利己的,并在“人是人的上帝”的口号下要求“建立人对万物统治的帝国”。与普罗泰戈拉“人是自然的主人”的观念所不同的是,近代的感性主义在人的自然欲望和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的自我满足,主张人的活动是自由自主的,而动物的活动则受自然本能的支配。这就把中世纪的神赋予人的智慧本能完全交给自身,人第一次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获得了自身的自由。在哲学发展史上,人的感性欲望第一次在自然本性的基础上得到高扬,人第一次把自己当作一个现实的感性的存在,进而关注人自身的物质欲求及在此基础上的精神欲求。在休谟怀疑论的拷问下,感性主义路线走向最终解体是因为:一方面,西方哲学具有形而上学的传统,因而侧重于人的感觉经验、关注现实生存幸福的感性论是反传统的;另一方面,感性论在真理问题上夸大了感觉经验的作用,甚至把外在的存在也看作“感觉经验的复合”。但经验论对人的感觉经验的考察唤醒了对人的感性欲望的关注,有助于正确认识人的本质,为确立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并在后来的费尔巴哈哲学中得到发展。

近代哲学虽然发展出感性主义路线,但因为这一时期的哲学家普遍认为,认识论需要以世界的存在和本质规定为依据,不论认识的主体还是认识的对象都需要一个形而上学的“根”,所以,形而上学的基础地位并没有被动摇。与感性主义不同,理性主义把理性看作人生而具有的本质规定。笛卡尔的“我思”(主体理性)是能动的理性、能动的主体,他的“我思故我在”奠定了主体形而上学的基点,使近代哲学走向主体自我意识哲学。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则发展了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他认为,单子是非物质性的,是精神的,其基本性质是知觉、欲求和欲望,单子因具有了思想的能力而成为“精神原子”。如此一来,对笛卡尔、莱布尼茨来说,真理本身是局限在意识的内在性之中的,而感性并不具有基本真理。正如陈永杰等指出的那样,“思维之内”与“自为的认识之内”,即意识的内在性是近代西方思辨哲学的基本建制,促使上述学者从先天的概念体系出发理解世界^[7],或者说是从自我意识的内在规定性出发理解世界。

德国古典哲学是自我意识哲学发展的高峰,康德以“人为自然立法”和“人为自身立法”的命题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并区分了现象界和物自体,“人类理性在其知识的某一门类中有特殊命运:它为种种问题所烦扰,却无法摆脱这些问题,也无法回答它们,因为它们超越了人类理性的一切能力。人类理性陷入这种窘境并非它自己之过。”^{[8](P5)}这就划定了人类理性活动的界限。为了使理性摆脱矛盾,获得满足,康德提出将以往“知识必须遵照对象”的思维方式转变为“让对象符合知识”。这一转变表明,一方面,康德认为知识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凡是应当作为对象被给予我们的东西,都必须在直观中被给予我们。但我们的一切直观都唯有借助感官才发生”^{[8](P290)}。另一方面,他也承认知识只能建立在先天基础之上,即只有

经验是不够的,“纯粹理性凭借先验理念使自己的知识形成一个体系”^{[8](P210)}。人通过直观能力和思维这两种认识能力获得知识,“无感性则不会有对象给予我们,无知性则没有对象被思维,思维无对象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9]。这是人类第一次明确意识到自身理性能力的局限性,直觉到人类的有限性,从而使主体占有了核心和能动的地位。

在实践理性的意志自由中,康德表达了同样的观念,即道德意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过,人虽然可以在道德领域为自身立法,选择一定的伦理道德法则,使人成为理性存在者,但人的至善追求却需要“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作为保障,因而人的自由只能存在于天国和理想中。也就是说,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向道德神圣性靠近是必然的。康德哲学使自我意识具有了自主选择的能动性,蕴含了自我意识对人的有限性的自觉,在高扬了人的理性能力的同时也指出了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即把人看作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体,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新发展。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将意识和自我意识看作是从直接经验进展到绝对知识过程中最初的两个阶段,从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过渡是从外物回归到精神的运动,而“自我意识是从感性的和知觉的世界的存在反思而来的,并且,本质上是从他物的回归”^{[10](P131)}。为了向实践哲学过渡,黑格尔将自我意识作为从理智活动向对象化活动,即社会领域转向的重要环节。他认为,“自我意识就是意识,感性世界的整个范围都被保持着作为它的对象……意识作为自我意识就拥有了双重对象:一个是直接的感觉和知觉的对象,另一个就是意识自身”^{[10](P132)},意识的对象不是外物而是自我。自我意识不是对外部感性材料的整理,而是将其吸收进生命活动,它是有生命的自我意识,而这样的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

足”^{[10](P137)}。自我意识之间相互排斥,但又彼此依存。在相互斗争中,自我意识获得确证,但同时是对确证的否定,所呈现的是“自我”与“非我”的对立。当进入到理性阶段,自我意识才实现了“自我”与“非我”的统一。这一阶段的“自我”试图进入自我以外的世界,在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中确立自身,“在过去,自我意识所关涉的仅是它的独立和自由,为了拯救和保持其自身,曾不惜以牺牲世界和它自己的实在性为代价……但是,现在作为理性,它感觉到自己与它们之间有了和平,能够容隐它们……当它采取这种态度后,仿佛世界现在才第一次成了对于它的一个世界……它才第一次发现世界是它自己的现实的世界,它才对世界的持续存在感兴趣。”^{[10](P175)}在黑格尔看来,意识能够根据自身发展中世界精神所处的阶段决定它自身与他物或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和解决方式。

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是从直接性、对象性意识中发展出来的,是最为直接的意识,因而是其论述精神现象的起点。自我意识通过在对象世界中意识自身,沟通主观与客观,并随着绝对精神的发展而被扬弃进入理性之中,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经过自我意识自身的辩证运动,“绝对精神”从逻辑阶段演化到自然阶段,而意识以绝对精神为根据,为人提供了尺度。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以人与自然和解为理论旨趣,在弥合了人类自身的存在与现实世界裂痕的基础上,把人的理性本质发展到了新的高度,赋予人的理性以最大的能动性和绝对自由。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提出了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他认为,人是保持自身、返回自身并且回到了自身的存在,“能在与其对立面的关系中保持自己”。自我意识在与对立面的矛盾斗争中确认自身、否定自身,并最终与其达成和解。黑格尔对“主奴关系”的论述揭示出自我在本质上的社会性,是在与他人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下被确认的,因而也就具有了实践的维度。

“哲学的真正出现,在于在思维中自由地、独立地把握自己和自然,从而思维和理解那合理的现实,即本质,亦即普遍规律本身。”^{[5](P7)}近代哲学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其必然将出发点建立在显示自我意识的立场之上,现实世界成为精神关注的对象,并通过理智上升为普遍性的知识,从而实现自我意识与现实的和解。“现世的东西要受到现世的裁判,裁判官就是思维的理智”,从此,上帝被拉下神坛,人的主体性得到恢复,“人获得了自信,信任自己的那种作为思维的思维,信任自己的感觉……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意志和成就。”^{[5](P4)}从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中可以看出,理性主义路线把人的理性本质发展到极端,而感性主义路线开辟出了唯物主义的认知方向。感性主义路线虽然开始了对现实和对感性的人的存在与欲求的关注,但由于没有正确解决人的意识起源问题,最终也只能把人看作是抽象的感性个体。即使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看作“类本质”,但作出的依然是抽象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说明,并没有在人的现实关系中考察人及人的活动。因此,这一阶段的哲学,虽然以人为研究对象,但无论感性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是从形而上的层面对人的本质作理论探讨,其结果也只能是在抽象的、纯理性的框架内认识人类自身,在限制自我意识发展的同时,也阻碍了人对自身科学认知的深化。马克思立足于感性的、现实的人,以人的眼光来看待人自身和世界,并确立人与世界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转换了以往哲学关于人及人的世界的视角,在实践视域下对人展开了现实的研究,使人类的自我意识走向丰富、完满,并找到了通往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理想道路。

三、马克思实践论视域下自我意识的发展

马克思在批判吸收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与康德、黑格尔只关注“彼岸世界”不同的关注“此岸世界”的理论,并把哲学的任务确定

为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他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以感性的、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将感性作为认知的起点,认为“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11](P194)}并且,人在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中才能获得自我认识。

马克思早期虽受自我意识哲学,尤其是青年黑格尔学派自我意识思想的影响,但他在现实基础之上,将自我意识与外部世界相联系。他在其博士论文序言中明确提出,不能将任何神与自我意识并列。马克思将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并不是要对原子进行物理学意义上的研究,而是着力于揭示原子是独立的、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是自我意识的象征。“正如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一样,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也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识。”^{[12](P54)}马克思认为,虽然伊壁鸠鲁的原子显示出了自我意识,但它们“只能自己和自己发生关系;只能自己和自己相撞”,无法对环境产生作用。一个“存在的个别性”只有与其他“存在的个别性”发生联系,它才能够得以实现。因此,“一个人,只有当他与之发生关系的他物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时,相反,这个他物本身即使还不是精神,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12](P37)}马克思基于对原子运动的分析,尤其是对其偏斜运动的分析,指出原子的偏斜运动是以自身为根据的必然选择。自我意识是与自身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意识。马克思指出,“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12](P37)}原子的相互碰撞改变了原有的运动方向,即原子是在与其他原子的关系中确定自身,并意识到自身的,而这种相互的关系则构成了世界。从思维逻辑来看,原子通过其他原子确定自身后,就要关注自身与外在的关系问题,在博士论文中,马

克思指出,“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的存在着的自身反映”,从而达成了自我意识与自然的和解。而他通过对伊壁鸠鲁天体理论的阐释则揭示了自我意识的最终归宿——“当主观性成为独立的东西时,自我意识就在自身中反映自身,以它特有的形态作为独立的形式同物质对立。”^{[12](P62)}原子既是物质载体又具有精神规定性,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这样的原子代表着具有主观意识的人。人必须要打破自己的定在才能成为自己的唯一的现实。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关系中,通过人的感性活动达成自然与自我意识的统一,实现自我发展,可见,马克思是将自我意识置于实践视域之下的。

马克思对原子的研究不是要在自然哲学的意义上展开,而是要将其深入到现实世界,从伊壁鸠鲁哲学中透视出的自我意识的主观原则使其研究转换为实践论视域。因为,马克思认识到,自由是必须逾越思想而转向现实世界的,他“把主体的自我意识看成是与现实对立的进步动力,试图去构建合理解释现实世界的理论框架”^[13]。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可以说是其理论研究的起点。

马克思基于其博士论文所奠定的理论基础,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他将人类历史置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之上,分析人的活动与活动中的人,把目光真正转到现实的人。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的本质的思想。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1](P499)}认识事物首要的是要抓住根本,而人的根本就在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以‘人=自我意识’作为关键支撑建构了解释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对象性活动理论。”^[14]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以

对人及其活动的考察作为逻辑起点,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的对象性活动的自由自觉性,并将其视为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1](P163)}作为有意识的自由存在的人,自由自觉是其本质的、内在的一般特性,这种特性的实现和验证是通过实践才得以完成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为探究人类自我意识提供了新的视角。如果说“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内在本质的规定是人的抽象本质的逻辑推演,那么实践范畴则使人的自我认识从天国回到人间,真正立足于现实的人的世界来理解人、看待人,也第一次真正找到了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现实路径。在实践活动中,人的社会关系形成并得以展开,人始终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并受其制约。因此,现实的社会关系形成现实的人生存的特定环境,并规定了人的存在样态。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不再是费尔巴哈的纯感性的人,而是存在于一定历史时期并处于一定关系之中的个人。虽然现实的人受制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但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本性又促使人类不断地超越自身的历史条件,在实践中实现自身并获得发展。因而,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马克思第一次在人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排除了抽象理性的作用,把历史交给实践的人,认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1](P162)}。

实践作为人特有的本质活动,使人能够借助于以工具为代表的媒介将自己的目的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使人的思想意识变成现实的感性的存在物。在这一过程中,人创造了属人的物质世界,同时也在感性的物质世界中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即实践在创造了属人的物质世界

的同时也创造了属人的精神世界。主体与客体间呈现出双向运动:即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运动——人类意识外化、对象化在物中,对象的本质、规律以知识形态凝聚在人的精神中。其结果是:人与物在实践中的关系促进了人类精神、思想意识的发展,使主体的活动能力获得提升,从而使人类在实践中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发展。从实践视角看,人不是一个既定的现成的存在,而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重塑自我的自为的存在。同时,由于人的意识在实践中得以物化,世界被打上了人的烙印,从而使人类能够在作为实践结果的感性存在物中得以关照自身的理想、意志和现实力量,第一次真正在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中反思到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实践体现出人作为自为的主体既能够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又能在人与世界的联系中反思自我、形成对真实自我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实践是理解人与人类历史的钥匙。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转向为科学地认识自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下,人既在实践活动中形成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反思能力,又在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了真正的人的需要,从而实现人的现实的生存与发展,使人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反思自身,形成关于人自身的真理性认识。人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创造着自己的现实生活,同时也创造着人自身,因而,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自为的人。人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不断突破外界物质条件的限制以实现自我超越,使人类历史不断由低级向更高级阶段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真正从人自身出发全面理解人、理解人类社会,也深化了对人类自我意识的认知。

四、结语

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把人看作与自然万物相

统一的存在,要求人运用自明性的理性去追求真理,但自我意识本身却仍处于被束缚的萌醒阶段;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虽然开始真正关注人,使人的主体性得以高扬,但是仍然将人归结为纯粹的理性存在,从而错误地排除了自我意识的感性基础。费尔巴哈在批判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强调要把人的本质还归人自身,要从人的感性存在出发看待人,但他对人的自我意识的认识仍然没有走出理性的樊篱。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实践视角,真正立足于现实的感性的人,“从自然史、社会史与人类史的视角出发,将抽象的自我意识回溯到具体的感性活动,将客观理性精神建立在人类历史进步的基础之上”^[15]。由此,历史展现了人的自我意识能力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由本体论阶段的非自觉的理性存在向认识论的自觉的主体意识阶段的转变,奠定了“认知主体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16]的唯物主义自我意识哲学范式。

[参考文献]

- [1] 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2] 黄颂杰,章雪富.古希腊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Taran L. Parmenides; A Text with Translation, Commentary, and Critical Essay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
- [4]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5]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6] 陈一鸣.“自我意识”对“本原行动”的遮蔽:费希特耶拿知识学第一原理辨惑[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1(6):139-146.
- [7] 陈永杰,柴玉芳.论感性活动对意识内在性的彻底翻转: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真理观的超越[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2):145-156.
- [8]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9]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52.
- [10]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3] 杨南龙.马克思主体性思想演变的历史逻辑[J].北方论丛,2022(2):21-27.
- [14] 贾云飞.“人=自我意识”与马克思对象性活动的建构[J].重庆社会科学,2020(11):44-53.
- [15] 潘斌.黑格尔自我意识的辩证进路及其批判[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36-43.
- [16] 刘坛孝,焦成.认知视域下语言的主观化建构[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87-94.